

中国经济史

〔上〕



侯家驹 ● 著

F129/19

:1

2008

中国经济史



[上]

侯家驹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侯家驹 台湾中兴农经所毕业，澳洲新英格兰大学农经硕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国贸系与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私立东吴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

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著有《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先秦法家统制经济思想》、《国际贸易的挑战》、《周礼研究》、《经济统一论》、《中国财金制度史论》等。

序

这本《中国经济史》，是我平生写作时间最长，而且最费心思的一本书。就前者言，此书的撰写，是始于1987年4月，完成于1997年11月，先后共费11个年头。初稿是完成于1995年9月中旬，即持此作为东吴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班教材，在教学的两年多时间里，将此稿作了两次大的修改，至于11年间的较小补充与修正，更是不计其数。此一情形，是以往著作所没有，所以说是“最费心思”，或者可说是“煞费周章”。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唯经济史观，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此一构筑的变化，必将导致作为上层构筑的政治制度之改变。其所秉持的史观，实在是始于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以下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则是出于其展望，至于在封建社会以前的原始公社与奴隶社会，则是其信徒后来将其所著“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社会”，改头换面，移花接木而成。马克思以封建社会为其唯经济史观之开端，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近代国家雏形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但他认为封建社会解构后即进入资本主义，则嫌过于笼统；盖因现代一般学者都认定资本主义是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崛起，而封建社会则是崩颓于公元1300至1500年间。

从西欧史实看，其发展情况大致如下：

900至1300年为封建社会

1300至1500年为灰暗时代

1500至1750年为重商主义

1750至1780年为重农时期

1780年起为资本主义

回顾中国早期经济发展史实，是和西欧若合符节，即：

西周为封建社会

春秋为灰暗时代

战国是重商主义

秦始皇与汉高祖重农抑商

汉代文景之治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到了汉武帝,为筹措军费,将盐铁酒收归国营,并采平准政策,才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即被扼杀。但在汉武以前的中国和中世纪以来的西欧,其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归纳出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

历程:封建社会→重商主义→短暂的重农→资本主义

动机:人类求生存、求发展

推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与均衡

所谓“制度”,基本上为静态,但在比较上,经济制度是比政治制度变动较多,这是由于常受人类求生存、求发展动机冲击之故,此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其实,马克思所据的史实,主要为西欧诸国,这些国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可以称为小国。在这些小国之中,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大国则不然,其政治力量因幅员广袤与人口众多,使执政者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莫能与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上层构筑。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应该互为表里。譬如封建社会中,政治上的封建制度配上经济上的庄园制度,以达成均衡,此一均衡是否稳定,则是取决于该国是大国还是小国:若是小国,则不稳定,以致失衡后难以回复原先状态,而将形成新的均衡;若是大国,则此均衡是稳定的,失衡后几将回到原点,此所以中国自汉武以后,出现一治一乱的(近似)循环。

中国的治与乱,正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写照。“合”是大一统,本书称之为“一元体制”;“分”是指分裂,称之为“多元体制”。二者实以人地比例为必需条件,这是由于在农业社会里,人地比例是重要因子,此比例大,意味着农民劳动生产力低落,民不聊生,必将揭竿而起,从而国家由“合”而“分”;战乱之中,人口大减,人地比例大为降低,天下渐有由“分”而“合”之趋势。

本书是将中国自秦汉起区分为三个一元体制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且自西周起,对于这些阶段或期间,均讨论其财经得失。除据具体史实从

一般经济理论观点予以评论外,还提出地盘成本(保障成本)或制度成本意念,以作衡量得失之标准,大致上,是将政府课征的赋税、力役,视为明显的制度成本,而将其政策的效果视为不明显成本,其对经济有良好效果者,则此成本为负值,若有不良影响者,则该成本为正值。

11年来,念兹在兹,一直以中国经济史为念,其中虽亦撰写若干篇学术论文,亦多环绕着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至于写作时间,则均在下午,利用午睡时间,每次写作,最多为千余字,大多时间是在千字以内,有时枯坐半天,未写只字,那是在阅读、构思。即在每写一章以前,将有关论著浏览一番,通常需时十天到半个月,将其要点择出,然后作运笔之构思,最后才是动笔。在撰写之中,若是获得新材料或是形成新意念,又须随时补充与修正。此一工程现在终于结束,但却既无如释重负之感,也没有空虚的茫然。这是因为一向是将治学视为娱乐,很多时间的愉快,是来自这一类的写作,易言之,从未以撰写中国经济史为苦差或负担,以致完成后,亦无“重”可“释”;为着追求治学之愉悦,下一个治学计划早已拟订,哪有“空虚”时间。日前写了一首“治学”的七绝,可作心境之写照,亦权作此自序之结语:

著作虽勤志不贪,敢干绝学只消闲;
文章千古心如镜,位在岑楼寸木间。

侯家驹谨识
于1997年11月5日凌晨

本年5月间,在杭州寓所小住,读书与冥思,思及留澳期间所创的一般化劳动平均生产力(GAPL)应是人类发展经济的追求目标,尤其是经由Douglas函数所求得之GAPL,是括及劳动技巧及其数量,资本数量及体现性技术进步,土地数量及其利用技术,以及非体现性的科技。这些可为本书主要内容提供理论架构,而且由此发现,当初,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量)”,似有GAPL的涵义,乃将第二章予以改写,其后各章再重新修订之处,达50余页次,幅度不可说不大。

又及

1998年11月10日

目 录

上册

序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3
第一节 经济史与史学.....	3
第二节 经济史与经济学.....	6
第三节 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12
第二章 经济史演进的轨迹	17
第一节 经济史的主体及其追求目标	17
第二节 经济史中的制度因子及制度成本	21
第三节 经济发展趋势与阶段论	26
第四节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及大小国之分	31
第五节 小结	37
第三章 中国经济史阶段划分暨写作大纲	40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史上阶段的划分	40
第二节 本书撰写方式	49

第二编 古代社会

第四章 原始社会	55
第一节 传说时期	55
第二节 唐虞时期	59
第三节 夏商二代	64
第五章 西周(前 1027—前 771 年)	
——封建制度之建立与衰落	71
第一节 出现近代国家雏形	72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划时代意义	74
第三节 封建制度下财经之优点	79
第四节 封建制度下财经之缺失	85
第五节 小结	89
第六章 东周(前 770—前 222 年)	
——由封建社会到重商主义	93
第一节 绪言	93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崩颓	97
第三节 战国的重商主义	107
第四节 东周财经的优异面	114
第五节 东周财经的缺失面	119
第六节 小结	123

第三编 第一次一元体制:秦汉——郡县制度

第三编附录 公元前中国经济发展之阶段	
——由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	130
第七章 由封建制度到一元体制:演变与特色	134
第一节 政治趋于专制	134
第二节 经济趋于统制	139
第三节 社会趋于管制	144
第四节 大一统在经济上的缺失	149
第五节 大一统在经济上的贡献	156
第六节 大一统与中国治乱循环	162

第八章 大一统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166
第一节 从户口变迁看南方之逐渐开发·····	166
第二节 阶级变迁与土地兼并·····	170
第三节 人民生活情况·····	174
第四节 财经职官概述·····	179
第五节 赋役制度及政策·····	183
第六节 货币金融制度·····	188
第七节 社会福利政策·····	194
第九章 大一统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199
第一节 公共建设·····	199
第二节 科技进步及企业家的出现·····	202
第三节 农业发展与重农措施·····	205
第四节 工业发展与公营事业·····	211
第五节 商业发展与经济中心之分布·····	215
第六节 对外贸易的发展·····	221
第七节 秦汉财经得失·····	224
第八节 大一统的崩溃·····	231
第四编 第一次多元体制:后汉末至南北朝——坞堡经济	
第十章 多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241
第一节 政治趋于乖离·····	241
第二节 经济趋于隔离·····	246
第三节 社会趋于疏离·····	250
第四节 战火蹂躏下的破碎经济·····	255
第五节 隔离与疏离的经济效果·····	259
第六节 多元体制对经济的贡献·····	263
第十一章 多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272
第一节 南方崭露头角·····	272
第二节 阶级变迁与宗教勃兴·····	279
第三节 人民生活情况·····	286
第四节 政风与财经官制·····	291
第五节 赋役制度及福利政策·····	299

第六节 货币金融制度	310
第十二章 多元体制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319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新整合	319
第二节 科技发展与公共建设	333
第三节 农工业发展与公营事业	343
第四节 商业发展暨经济中心	349
第五节 国际贸易的曲折发展	357
第六节 多元体制下的财经得失	360
第七节 小结——由分裂趋向统一	366
第五编 第二次一元体制：隋至盛唐——府兵制度	
第十三章 第二次一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375
第一节 政治趋于开明专制	375
第二节 经济趋于放宽统制	379
第三节 社会趋于松弛管制	384
第四节 略论隋唐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389
第五节 长安：世界性首都	397
第十四章 第二次一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402
第一节 南方成为经济重心	402
第二节 人民生活与由俭入奢	405
第三节 财经官制	409
第四节 府兵制度下的田制与税制	414
第五节 货币金融制度	424
第十五章 第二次一元体制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430
第一节 公共建设	430
第二节 农矿业之发展	434
第三节 科技暨工业发展	440
第四节 商业发展与经济中心	446
第五节 隋唐对外贸易	449
第六节 隋唐财经得失	453
第七节 小结：天下又由合而分	463

第一编 绪论

中国是最注重历史的国度,所以成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钱穆于《国史大纲·引论》中,首先列举其三特点:一曰悠久,自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竹书纪年》记载夏代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二曰持续(钱氏曰无间断),自西周共和行政以来,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三曰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而言,计有编年(始于《春秋》)、纪传(本于《史记》)与纪事本末(源于《尚书》)三者,其他更不胜枚举。

尽管如此,中国却缺乏有系统的经济史,这是由于中国正史是以政治史甚至于是帝王史为主体,即使有《食货志》等类史书,亦多是聊备一格而已,何况亦仅为史料,缺乏系统性著述,而且多只限于总体经济面赋税数据,且为断代性。是以,在当前情况下,亟须一本通史性中国经济史。

为着避免中国经济史成为史料之堆砌,必须要用经济理论以认识史料,但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即治史原则与方法,亦应有所秉持。且因中国经济史既为通史,若按朝代叙述,将难掌握其趋势,致须划分若干阶段。

第一章

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经济史是一种混合学科,既属于历史,又属于经济学,所以,在说明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以前,要分别说明经济史与史学以及其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相当后起的学科,若从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算起,到现在只不过两百多年,而真正的经济史著作,则出现得更晚,就西方言,主要是出版于 19 世纪——中国正史中虽有《食货志》等类记述,实则只是历史的附庸,而且多为财税材料之堆积,谈不上有系统的著作(《史记》中《平准书》与《货殖列传》除外)。西方的经济史既然后于经济学之发展,照说,其内容应受经济理论之指引,但揆其实际,并非完全如此,这将探讨于第二节。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在发展上虽然早于经济史甚至经济学很多,但在发展上——尤其是近代的发展上,却深受经济史及经济学的影响,这将在第一节析述。

关于经济史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接受经济理论的指引,反映出以往经济发展过程实况,帮助读者明了目前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归纳经济发展史实,以丰富甚或批判经济理论的内容。至于经济史的范围、定义,以及撰写经济史的指导原则,主要是从历史学,尤其是从新史学领域中所撷取。

第一节 经济史与史学

经济史的直觉性了解,厥为经济方面史实的陈述,是以,从史实的陈述观点看,经济史应该是属于一般性历史中的一支,因为“简单的

说，历史（亦）只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纪录而已”〔1〕。可是，无论中外，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实质上都是政治史，中国廿五史的本纪，固皆为政治，列传中除《儒林》、《文苑》等类外，亦均属政治范围，西方亦是如此，所以，英国史学家 Freeman 干脆地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2〕这些都可统称为旧史学，鲁宾孙（J. H. Robinson，大陆译为罗宾逊）曾将这些史学家的通病，归纳为三点〔3〕：

1. 随便包括人名地名，并没有什么意思，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同兴味，适足以压下他的精神；
2. 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事实的记载；
3. 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不是因为它们可以说明人类状况的进化。

或者某时代的一般情形，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上很特别。

所以，鲁氏提倡“新史学”，要摆脱这些通病，并要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鲁氏《新史学》一书是出版于1912年，十几年后，巴恩斯（H. E. Barnes）出版《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认为“据新史家之意见，史学之目的，在以过去时代之庐山真面目介绍于现代，使之理解现代文化成立之经过与原因。夫如是，然后始能知悉吾人文化中之重要实质与进步，以及原始时代遗下阻碍进步之残余”；并认定“新兴史学中之新元素，为对于人类发展中经济、社会、科学诸因素之更加重视”，盖因“承认文化之基本为经济”；进而指出：“现代史家，坚守成规，执迷不悟，对于经济史部分完全置之不理，然而经济史最重要之著作，已于上世纪最后25年内完成。传统史家只知注意贵族论题，如路易十四之服饰，考尼茨之狡诈，路易十五之不德……而对于Colbert之经济政策，Turgot之财政改革，或大陆体系之经济形态，反而藐视之，不屑加以考究。其结果，大

〔1〕 P. Smith（黄超民译），《历史家与历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一章。

〔2〕 引自J. H. Robinson著，何炳松译的《新史学》（台湾重印本），第一章。

〔3〕 同上。

学中之经济系，遂不能不欢迎历史中被排斥之最重要部分而加以培养”〔1〕。后者显然是指 1890 年代，英、美大学于经济系，开始讲授“经济史”，但法、德等欧陆大学迄今仍不太愿开授此一学科。

巴氏所说的“历史中被排斥之最重要部分”，当然是指经济史，而对其持“排斥”态度者，当然是指旧史学，至于新史学则视之为“最重要部分”。其实，新史学之发生，实在是溯自经济学家对历史的诠释，鲁宾孙就曾说：“无论如何，19 世纪以前历史学家所不注意的那些永久的而且普通的原动力，现在能够特别注重起来。开这条研究新路的人，不能不首推经济学者。”〔2〕其所说的“经济学者”，即指马克思。易言之，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问世，引发史学界的“革命”，出现注意与运用社会科学于历史写作的新史学。

但因经济史亦在陈述史实经济面，所以，在撰写上，当然亦要受到一般史学的规范。在这方面，中国史学颇有值得借镜之处，盖因中华民族最重视历史，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起，就有正确而不断的史事记载。

所谓史学，乃是有关撰写历史之理论，其所涉及的，至少为“人”与“事”。所谓“人”，是指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条件；所谓“事”，是指史事如何选择。关于历史学家应具之条件，刘知幾认为是史才、史学与史识，此即刘氏所云：“史有三长，才、学、识。”（《新唐书》本传）〔3〕其后，章学诚增加“史德”一项〔4〕。梁启超曾将这四个条件，按其重要性依次排列为史德、史学、史识与史才，并予解释：史德是指力求忠于史实、不夸张、不歪曲、不附会、不武断；史学讲求搜集资料，判断真伪，抉择取舍的方法；史识是指敏锐的观察力，但须避免

〔1〕 H. E. Barnes,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Ch. 1. ——参见董文荣，《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台湾重印本）。

〔2〕 J. H. Robinson（何炳松译），《新史学》，第二章。

〔3〕 刘知幾于《史通》之中，实仅言及史识与史才，分见卷七中之“鉴识”与卷九中之“核才”。金静庵予以解释道，“惟只论史才史识，而不及史学，何也？夫岂不以史通全书，皆关论学，不待明言，而读者自能了了耶！”——见氏著《中国史学史》（鼎文书局重印本），页 273。

〔4〕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

为因袭传统思想或自我成见所蔽；史才是指撰写历史的技巧，涉及材料的组织与文字的风采〔1〕。但从世界观出发，可能还要加上鲁滨孙所说的“史心”〔2〕。鲁氏对此并无明确说明，此处所谓的“史心”指史学家要把握历史精神，是动态的、进化的，而且是综合的，须利用各种社会科学成果以说明历史的进程。关于史事的选择，张荫麟于其《中国上古史纲·自序》中所提及的五个标准，可说是言简意赅：第一是“新异性标准”，即指时空位置的特殊性——但与鲁氏所指斥的“最不普通的故事”不同；第二是“实效标准”，凡史事所直接牵涉或间接影响人群的苦乐愈大者，则愈为重要；第三是“文化价值标准”，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依此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为重要；第四是“训海功用标准”，所谓训海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一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是以，训海功用愈大的史事愈为重要；第五是“现状渊源标准”，凡史事与现代状况关系愈深，或愈有助于现状的解释者，则愈为重要。史事经常是赓续的、繁杂的，上述五个标准，只能协助个别史实的选择，而难以系统化，所以，张氏于《自序》中，又指出用来统贯“动态历史的繁杂”，主要有两大法则，一为因果范畴，一为发展范畴——从这一点看，张氏所云，又有些像是“史心”。关于史学中“人”与“事”各种条件，在经济史上的运用，将于第三节中释论。

第二节 经济史与经济学

中国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史，《史记》中虽有《平准书》、《货殖列传》及《河渠书》，且自《汉书》起，史书多列有《食货志》与《沟洫志》等有关专志，惟多为史料之堆砌，缺乏统贯性，而且很多正史并无这些专志，例如《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五代史》、《新五代史》十二史缺《食货志》；缺《沟洫志》或《河渠志》者更多，除此十二史外，《晋书》、《魏书》、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中华书局，1936年），第二章。

〔2〕 J. H. Robinson（何炳松译），《新史学》，第二章。

《隋书》、《唐书》、《新唐书》、《辽史》、《金史》七史亦未包括。至于通史性的经济史更付阙如——《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食货》，更只是史料而已。在西方，早期情况更劣，古代的西方历史学家，根本不重视经济史，因为他们都是僧侣，只注意僧侣们的事情，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实与经济史背道而驰，直到城市经济开始发达的时代，人们才开始写下关于经济事物的思想，John Wheeler 于 1601 年出版的《商业故事》（*A Treatise of Commerce*），可能是这方面的第一本专书，该书虽然也包含了很多历史的记述，但仍然是一本实用的书，而不是历史书。谈到西方经济史，不由人不提起苏格兰的两位亚当（Adam），第一位是亚当·安德逊（Adam Anderson），他于生前写了两本厚书，死后，被扩充为四本书，初印于 1764 年，题名《商业起源的历史与年代之推论》（*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Origin of Commerce*），由洪水时期写到他的时代，即由诺亚方舟写到东印度公司商船队带回香料及棉布。其书名虽称为商业史，但其内容正与经济史相同，因为安德逊于此书中注意贸易、制造、殖民地、人口、贸易差额、货币及生活程度之提高。不久，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 1776 年出版其不朽名著：《国富论》，这虽然是本经济学著作，但其中攸关于历史的章节，在英文中，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研究经济发展的最光耀论文。至于西方经济史的著作，一直到 1880 年代才进入成熟时期〔1〕，例如 W. Cunningham 于 1882 年出版的《英国工商成长史》（*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成为第一本有系统的英国经济史（见《大英百科全书》）。

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也”〔2〕，西方若干经济史学家亦持类似看法，而认为若干经济学著作是经济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剑桥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克拉彭（J. H. Clapham），不仅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历史和经济分析混合到恰到好处，他也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第五版起就变成一部人口史与积极节制人口的工作史；马克思主义比任何其他学说都鼓励人们从事经济史的思维和研究的工作，他甚至说“我觉得马歇尔（A. Marshall）是个伟大的经济史学

〔1〕 参阅 N. S. B. Gras 著，鞠清远译的《经济史之兴起》，《食货半月刊》2 卷 3 期。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